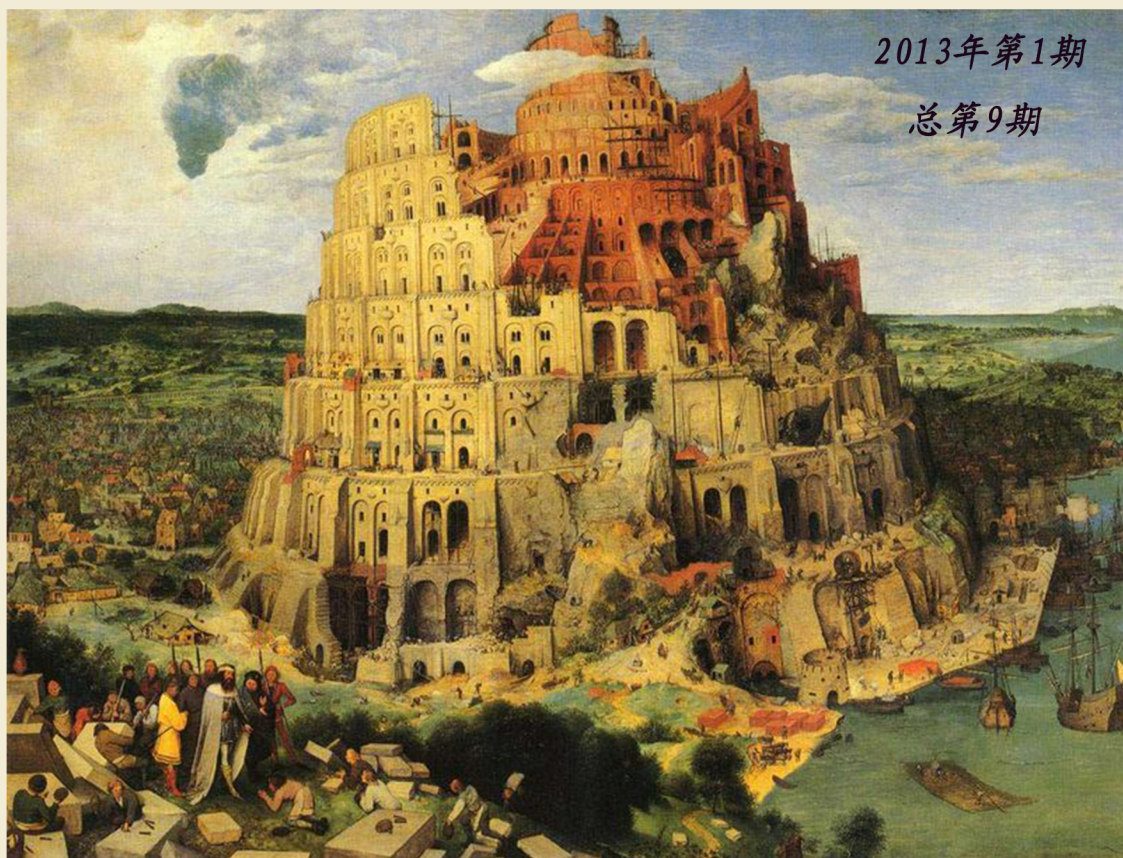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



2013年第1期

总第9期

◎学人访谈

◎专家特稿

◎国际问题研究

◎天下

刘擎教授访谈录

全球治理研究大有可为

基辛格再研究

我们的中国梦

靡石有初，緝志有終。

馮紹雷

思接千載，視通萬里

與“聞道”學子共勉

林孔云

2011年3月10日

聞道

国家开发银行-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闻道》编辑部 主办

2013年4月



S A I A S

主 编： 吴逢勇

副主编： 叶小娇 曹乔圆 崔 攀 孟维瞻

编 辑： 陈安龙 武亚宁 许子兰 章航翔 周生升

朱承璋 朱永福 李 洋 杨骥铭 李沁笛

柴 捷 杨晓娜 孟 舒 翁伏虎 王亦冰

李后立 蔡一麟 陶以连 黄敬荣

设 计： 章航翔 崔 攀 叶小娇 蒋霁望 李 娟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

理科大楼A座410室

邮 编： 200062

邮 箱： ggwendao@gmail.com

微 博： <http://weibo.com/u/2532279030>

博 客： <http://blog.sina.com.cn/u/2532279030>

网 址： <http://www.saias.ecnu.edu.cn/il265.htm>

注：未获本刊事先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本刊内容

托克维尔的自由政治

吴途勇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由于领导人之推介，从一本枯燥乏味的学术著作，转眼间成为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书中观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少人甚至总结出“托克维尔定律”：革命发生于开始改革的地方，坏政权改革之时正是其最危险之时。

我相信许多人在读此书时，会情不自禁地将托克维尔笔下的 18 世纪的法国与 21 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并有历史惊人相似之感。这或许正应验了托克维尔的名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但我更相信“托克维尔定律”非《旧制度与大革命》的中心，甚至不是重点，18 世纪的法国也非当今中国可比。托氏的关注中心是自由政治。

自由的人需要自由政治。每个人都有自由之天性，但专制集权政治却会使人养成奴性，让人暂时忘记自由。自由虽是之天性，但自由意识和自由能力，需要发掘和培养，自由的政治能力也需要习得。自由政治能力的习得需要有活力的公共生活，这就是自治。

自由与自治具有共生性。自由不是冥想之观念，而是实践之能力。自治能力和自治精神的退化、消失，自由的心灵久久得不到滋养，就走向了枯萎。当自治消失，政府机构成为特殊等级人士的俱乐部之时，政治自由就退居幕后，假自由和假民主登上舞台，寡头政治当仁不让。在以寡头操纵为特点的集权政治时代，我们看到的是普遍的政治冷漠和低下的政治能力。托克维尔认为，正是中央集权制度破坏了法国曾有过的自治。

自由的落实需要恰当的制度实践和制度设计。托氏认为，在民主时代，平等虽然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具有自由政治实践能力的精英仍然不可或缺，他们能够导引积极的自由政治。

然而，中央集权制对社会的极力控制，权力直接面对个体，容不得真正有自主能力之社会团体的存在。因此，“众人”虽热闹，社会却很孤独。对于自由政治，托克维尔的教导是：坏的改革，可以有悠久自由传统的民族变得充满奴性，而好的制度改革，则可再造自由国度。



道
不遠
人，遠
人
非
道
也。

夏
洪
二〇一二年五月





卷首语

托克维尔的自由政治/吴途勇

学人访谈

刘擎教授访谈录 1

专家特稿

全球治理研究大有可为

——为什么中国最终接受和拥抱了全球治理？/庞中英 13

国际问题研究

基辛格再研究——克服四个束缚/周一骏 18

台湾族群政治与民族主义

——两岸和东亚格局的视角（上）/张友谊 37

后冷战时代日澳关系的中国因素/许善品 52

专论

微博问政的发展前景探析/李彬 63

天下

我们的中国梦 76

话语·幽默 80

城市

古都金陵/蒋欧悦 82

探访浪速之城——大阪/蔡一麟 86

书评——群众与时代

“群体无意识”的民意——读《乌合之众》/黄钰钧 89

那些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读《狂热分子》/李沁笛 93

国关要闻

专题报道

白俄罗斯驻沪总领馆赠书仪式暨白俄罗斯诗人诞辰纪念晚会

在我院举行 97

“周边合作与中国成长”学术论坛在沪举行 98

简讯 100

院外播报 102



刘擎教授访谈录

学人小传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兼职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曾任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访问研究学者。

研究方向：西方思想史，政治哲学，国际政治理论。专著《悬而未决的时刻：现代性论域中的西方思想》，编著《何种文明？中国崛起的再思考》、《自由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思考》，译著《现代性的教训》、《以赛亚·伯林的遗产》及论文《儒家复兴与现代政治》、《中国崛起与文化自主：一个反思性的辨析》、《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等。



求学经历与早期职业生涯

《闻道》：从您的简历能看出，您先后取得了化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工作了几年之后，又赴美攻读政治学，那您是怎么想到要从工科跨到政治学的呢？

刘：这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其中最重要的，是八十年代那样一个时代背景。我最初选择读理工科，是因为在文革结束后不久，整个社会有特别强的重理轻文的心态。可能是文科跟意识形态的纠葛太多，父母告诫学文科会比较麻烦甚至危险，而理工科离政治比较远，是客观扎实而且有用的知识。当时有句话大家都知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不少人对文科有偏见，认为是没有能力学好理工科的人，才去选择读文科。我也就这样选择了化学工程。

我们“60后”这一代成长在后文革的1980年代，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时期，那是一个思想的大时代，也是一个社会变迁的大时代。当时有一个“文化热”的潮流，许多思想和观念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所以整个八十年代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社会和世界的理解，也感染着每个年轻人去关怀和介入公共生活。深受时代的感召，我和同代人一样非常关注社会变革，也关心有关历史、哲学和人自身的各种理论。我那个时候大学读得很早，对这些东西特别敏感，也尝试写各样的文章。那是

一个思想川流不息的时代。我曾写过一首诗，其中一句是“思想的暴雨打湿了我們年轻的头颅”。

大学的经历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我是1978年秋天入学，是恢复高考后第二届大学生。当时学生的年龄层差距很大，有所谓“老三届”的学生，也有应届和跳级入学的。我读完高一就跳级参加了高考，进大学的时候15岁，我们班长32岁，我睡他上铺，他总开玩笑让我叫他叔叔。那时候也有寝室的“卧谈会”，但和你们现在的卧谈会大概不太一样。我们喜欢讨论非常宏大的问题，私人的话题则比较边缘。比如当时的“伤痕文学”，重印的西方经典文学和思想名著，还有许多有争议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从年长的同学那里，我听到许许多多关于文革和知青亲历的故事，激发了很多的思考。

一开始我只是想作为一个业余爱好来关心人文社会科学。但年轻人有一种“追问究竟”的热忱，后来就总想学习社会科学或者是哲学。我在化学工程系毕业之后，在实验室留了一年，然后就转到了社会科学部去，教“科学哲学”的课程。那时候科学哲学对中国来说还是非常新的，如卡尔·波普尔、托马斯·库恩等人的学说。当时书都还没翻译过来，只有些翻译的文章和介绍性的文章。我就靠这些文章开始上课了。

《闻道》：那您弃理从文是完全出于兴趣还是希望真的能以此改变社会？

刘：可以说，我转向社会科学，是出于个人的知识兴趣，但追究起来，这种兴趣的形成与当时更大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我后来有想过，如果我继续做一个工程师，其实也会做得挺不错。还有，我年轻的时候还喜欢文学，有过戏剧和诗歌的创作练习，也曾想过去当个作家。钱钟书说，年轻人常常会将自己的创作冲动误认为是创作才华。我说不定就是这种情况。当时一直考虑自己的爱好是否能和自己所学的专业兼容，最后发现还是太纠结了。最终还是放弃了化学工程。

还有导师的鼓励。那时候我在东华大学读研究生，我的导师是一个女教授，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专业上要求很严格，但对年轻人的想法又非常开明和包容。她现在是东华大学唯一的一位工程院院士。我是她的第一个研究生。当我决定转学文科的时候，虽然她觉得有点可惜，但她更相信“热爱是人生事业的最重要动力”，所以也非常鼓励我自由发展。回想起来，我很感谢她的鼓励 and 爱护。

另外是家人的影响。我们父母的教育比较倡导民主，他们会给我很多意见和忠告，但最后的选择是由我自己决定，也由我自己承担后果。当时打孩子是通行的教育手段，差不多是“普世价值”，很少有家长不打孩子的。但我们家还算比较尊重孩子的意见。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也打过我，但他主张打孩子只是不得已的手段，是为了让孩子从无理取闹中冷静下来，进入“讲道理”的环节。所以每次打完之后都会有一次长谈，父亲会给出一些

理由，来“论证”为什么我犯的错误应当挨打，也允许我提出理由来反驳。然而到了大概 10 岁以后就不打了，因为他认为我随时都可以进入讲道理的状态。再到后来，父亲发现他的道理竟讲不过我了，这才意识到“民主”其实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

《闻道》：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文化意识和思想观念对您的学术研究有哪些影响？

刘：影响很深刻。几年前，查建英出了一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当时开了个座谈会，有许多 80 年代的遗老遗少参加。在会上谈起来，我算是 80 年代的“遗少”，当时只有二十多岁，开始接触到知识界的一些具有影响的人物。比如王元化先生，我在 1983 年就认识了。后来在 1986 年参加过甘阳主持的一个高级文化研讨班，接触到《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的许多学者。有机会和这些前辈学者交流和交往，对我影响很深。80 年代突出的特点是思考大问题。很多书写言谈，动不动就是上下五千年、横跨东西方、人类文明之类很开阔的问题，虽然在学理上或许相当粗糙的，但在当时这些论述一下子打开了人文社会的视野，特别是在长时间的封闭状态之后，那种震撼力是爆炸式的。你的世界就一下子打开了，经常处在思想亢奋的状态之中，不断地有新书要读，有新的聚会，听到新的观点。那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疾风暴雨般的时代。那么大家关怀的问题就很大，不太关注自己的个人生活，似乎显得微不足道。也许是因为个人的实际生活还没有什么新的机会。那时候市场经济还没有真正开始，也没什么赚钱的机会，没有时尚品牌、没有互联网，所以大家更为关注精神和公共生活。相比之下，90 年代开始私人领域发展起来，多样化的生活方式、休闲和娱乐等等变得更有吸引力，知识生活开始边缘化，学术界也越来越专业化，研究和写作都针对比较特定的问题。回过头去看，80 年代的学术不够专业，不够精致，年轻人就敢处理自己实际上驾驭不了的大问题，我也是一样。到美国读书，第一学期交的论文，老师看了之后很惊奇：天哪，你写这个问题要用几本书才能处理，你竟敢这样写！但美国的教授也很理解，说中国处在一个大时代，有点像欧洲的启蒙时代。那时候孟德斯鸠、伏尔泰一代人，也是关注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说 80 年代的学生思想界在学理上不够精致，但有一种精神气质，对我来说有很深的影响，许多根本的问题意识可以说是被那个时代塑造的。

反过来说，我们也可以检讨当下的学术思想界有什么缺陷。我们变得特别专业化了，但有时甚至变得琐碎，专注于细微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按美国人的说法就是“*We know more and more about less and less*”，就是说“我们对越来越小的东西知道的越来越多”。我希望你们这一代学人不要失去大问题的视野，但你做的研究又在专业上是扎实的，站得住脚的，能以小见大才是最好的学术。而等到你们年长的时候还能处理大问题，不是粗糙的

和感性的方式，而要有足够的专业训练作为基础。我觉得我们是过渡性的一代。现在的“80后”、“90后”甚至“00后”的一代学人有可能关心很重要的时代问题，同时又有很好的专业水准。这样一代学人的兴起，才有可能使中国知识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闻道》：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回国之后先到了香港工作的呢？

刘：这个也是挺偶然的。我在八十年代结识金观涛、刘青峰学者夫妇，他们在80年代主持了“走向未来”丛书，在思想界非常有影响。在1988年，金观涛先生本来有计划招收我去跟他读博士。但在之后的那一年就出现了一些波折。他们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开始也尝试让我到中文大学去读书，但没能成功。最后我就去了美国，出国时候我取道香港，在他们家住了几几天，再去美国。此后我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也为他们主持的《二十一世纪》写过文章。到2000年，当时我还在写博士论文，刘青峰老师很希望我参与《二十一世纪》和新的学术网站《世纪中国》的编辑工作。我就去了香港中文大学工作，在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了三年。中文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非常频繁，来访的既有国际知名学者，也有许多来自内地的中国学者。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对自己扩展视野非常有帮助。香港是一个文化活动很活跃很丰富的地方，非常有吸引力，但对我而言似乎不是一个安居的地方，只是一个驿站。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我决定回到上海。在朋友的介绍下，到华师大历史系工作。

关于民主

《闻道》：您在0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说过，“奥巴马的出现显示了自由民主自我革新的可能，而奥巴马如果胜出或许会重新激发民主政治的活力，给民主政治带来新的希望”。那现在回过头来看，您觉得美国有什么改变吗？

刘：我当时在文章中用了“或许”，做了某种保留，因为社会科学家做预言是非常危险的。奥巴马继承了美国政治中的进步主义传统，这是确定无疑的。但他到底能推进多少革新，很难说，也取决于你怎么来衡量。比如有人认为，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是民权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进步，可能有点夸大，但从进步主义的角度来说，是有道理的。进步的标准是什么？在美国的社会背景下，就是让更多的人更公平地分享这个社会的成果。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全民保险的国家，大概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口没有得到医疗保障。为了向少数人提供这个保障，必须让多数纳税人共同承担成本，在美国这样一件事情是很难推动的，这需要政治家做许多工作，但奥巴马还是做成了。虽然保守派威胁说在他们重夺权力后会取消这个医保方案，但这没那么容易的。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分权制衡成为主导传

统，任何改革都不容易。因此，奥巴马要推进他的医保计划，会在现实操作层面遇到很大的障碍，特别是在美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在美国政治两极化趋势非常强的时候，就格外困难。奥巴马也为此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妥协。因此，如果以后做历史回顾，这个进步具有里程碑意义。

民主政体也仍然存在进一步民主化的任务，因为民主的理想没有在任何地方充分实现。在美国推动民主化，不可能通过一个推翻体制的革命行动来实现，只能利用现有体制中所能许诺的那个最激进的部分，那个最高的道德理想为依据，努力改变现实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是在坚持这个理想，但他实现了多少，是否达到了我们最初期待的水平，这是有待检验的。有人认为，他的第一个任期会受到连选因素的约束，但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他有开阔的空间可以施展他的抱负，可以完全大胆的推进他的计划。但困难是，奥巴马很不幸地处于在一个经济不好的时期，同时面临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两种压力。当然这也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有人认为，效率与公平之间存在张力，高效率的经济增长一定会损害社会福利；但也有人认为，从长程来看，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是一致的。一个总统处在四年或八年的任期内，要面临很多现实的政策选择。奥巴马不得不在恢复经济增长与保证社会福利之间做一个困难的平衡。

《闻道》：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您认为中国应该是先有民主的民情，还是应该先有一个民主的体制才能推动民主的发展。

刘：托克维尔的民主论述有一个著名的见解，就是健康的民主依赖良好的民情（les mœurs）。民主不只是一套制度，如果只有形式的民主而缺乏公民精神，哪怕我们有了投票选举也不会是一个健全的民主。在托克维尔的启示下，许多中国学者也强调民主要有一定文化基础，需要有良好的公民精神，所以倡导公民文化建设，挑战制度决定论。我想这是有道理的。我们大概都承认，某种特定的价值信念和习惯是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我们如何养成这种“民情”呢？我们已经听到不少关于“价值重建的呼吁”，但我们知道，文化价值最容易呼吁，也最容易空洞。文化价值总是在实践中习得的，而实践总是制度环境和条件下的实践。

实际上，关于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托克维尔还有一个观察非常值得注意。我们说的自由民主制度类似于他所谓的“自由的技艺”（l'art de la liberté）——法律、制度、政策等等，而我们说的文化价值接近他所谓的“自由的习性”（les habitudes de liberté）——宗教信仰、风俗民情、自治精神等等。托克维尔认为，“自由的习性”比“自由的技艺”更有力、更基本也更可靠。这个教诲我们印象至深。但托克维尔的教诲还有另一面，就是强调，如果一个民族缺乏“自由的习性”，就不得不依赖“自由的技艺”来塑造这种习性，在“自由的习性”比较薄弱或缺乏的情况下（中国正是如此状况），“自由的技艺”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换句话说就是要用制度来培育这种文化，

因为制度和文化是互相塑造的，是互为因果的。虽然用技艺来塑造习性需要巨大的耐心，但除此之外似乎别无选择，否则我们就陷入制度与文化互相牵制的死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制度（特别是法治）对中国的民主建设而言非常重要，有了健全的制度不一定马上产生好的民主效果，要在长期调试和运作中才会滋养一种良好的公民精神和素养，而好的公民品格才会让制度这一机器产生更好的结果。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闻道》：您能给我们辨析一下“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区别吗？

刘：简单地讲，“现代化”——回到韦伯的经典定义——就是整个世界的理解和社会秩序的一种合理化、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我们治理社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用理性来计算和安排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一个社会越是理性化，就越是现代化。比如说，我们的生产方式是以工业化为代表，工业化是什么？工业化最重要的就是机器。机器为什么能够成为可能？因为机器有它的运作原理，原理服从科学技术的规律，且规律是普遍的。接受培训，只要进行相同的训练，就可以造出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复制和预测，比如富士康、麦当劳、肯德基等等，所谓“连锁”就是这个概念，可以称为“受控实验系统”，只要条件控制好了，结果就是可重复的。在现代化的视野中，生活世界背后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只是服从一个自然的、理性的规律。这就是现代化的基本精神。

民主化在不同人那里有不同角度的理解，有人把它看作一种价值，有人把它看作一种制度，有人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就有狭义的民主和广义的民主。在我看来，民主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形态，有不同的层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人民主权作为政治权威的正当性依据。最高的主权者不是一个君主、一个上帝或者一个祖先、一个超验而神秘的存在，而是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讲，除了神权国家，大部分现代国家都主张民主，比如，冷战时期的东西两大阵营，都自称是民主国家。但是，民主还有一个狭义的、操作性的维度，就是民众政治参与的过程，或者说进入制定政治议程和决策的过程。当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让全体人民参与。最终，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所有政治都是某种“精英政治”，但在民主要求政治精英与作为主权者的人民之间有特殊的“代表”关系。比如，人民代表，是我们选出来的，由于我们选举了他，他对我们具有一种代表性。许多地方的议会制叫“代议民主制”，有些地方的总统也是民选的，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代表理论实际上很复杂。

现在国内的某些学者主张，选举未必是唯一的代表方式，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比如，选举会受到金钱、利益集团、信息垄断的操纵等等。民众投票可能只是一时起兴，他们也许根本不了解情况，去投了票就以为反映了自己的利益、反映了作为人民的意愿，其实他们根本不清楚自己的利

益是什么，特别是长远利益是什么；哪怕他们知道自己的利益，也很难分辨在特定的背景下，哪一个候选人或者哪一种政策才能够更好地表达他的利益。现在的公共政策非常复杂，不仅需要一些常识，还需要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才能理解和判断。民众可能是不具备这样的知识。所以，让百姓去投票表决，在形式上好像充分地民主了，但事实上，反而容易被政治精英操纵，所以选举民主制是一种虚伪的民主制。

这种批判似乎很有道理，在当下也相当流行。但对选举代表制的批判，几乎全部适用于其他的非选举性的代表方式。比如，如果有这样一个精英团体，在智力上、知识上和道德上都比普通民众优越，这个团体可能比你自已更知道你的利益在哪里，也比你更知道用什么方式实现你的利益是更有效的，而且能够判断你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之间的差别，既能够体察人民的疾苦，又能够自觉地使自己的团体利益服从于人民的利益。由这样一种团体来代表人民，那不是更好吗？不是一种更实质性的、更具有深度的代表吗？

这种代表理论很完美，就像父母可能比孩子本人更能代表孩子的根本利益。但问题是，是这个精英团体如何产生？如何保持这些优良品质？这种深度代表如何免于被金钱腐蚀？被各种利益集团收买？用一个理念中的构想来指责现实中的实践总是具有优势，但这往往陷入幻觉。

另外，我在一篇文章中写过，选举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意义没那么简单，需要重新思考。的确，几乎所有严肃的政治理论家都承认，选举本身并不意味着民主，将民主化约为选举是一种肤浅而简单化的观点。健康成熟的民主政治需要活跃强健的公民精神，要求平等开放的公共领域，要求法律保障下多种渠道的公民参与，使民众得以广泛而深入地介入政治事务的进程(包括议题的设定和多种视角的商议与辩论)，并影响重要政策决定。这是当代政治理论中“审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和“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的核心主题。但是，当我们说“仅有选举是不够的”，并不意味着选举对于民主政治是可有可无的。

时常听到些貌似深刻的理论言说，将选举视为“选主”而贬斥，并称之作为一种“迷思”。这类理论家将投票选举化约为技术性程序来理解，本身就陷入了一种肤浅的实证主义陷阱。他们似乎忘记了马克斯·韦伯关于人、关于社会的基本教诲：人是自我理解的存在，社会是意义的世界。选举远不只是一个选主程序，而是“人民出场”的象征行动与仪式，包含着巨大的政治文化意义，因为人民主权观念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前提。的确，人民主权必须被代表，而所有的代表方式都难以“完全保真”，都会有“代表性不足”甚至“代表性断裂”的隐患。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代表方式在性质和程度上都同样是是非民主的。

对现代政治而言，选举作为“让人民出场”的行动和仪式，是达成政

治代表性的重要（虽非唯一）方式，也是以公开论辩与选择来代替战争和政治暴力的有效（虽不完美）方式。这构成了现代公民“政治想象”的深层部分，是历史与实践造就的意义世界，也就不是任何理论家通过概念辨析能够消解打发的。严肃的社会科学家应当知道，普遍的社会想象构成了“社会实在”，而任何批判性论述若是无视人们最深层的自我理解与意义世界，便会失去批判的最终依据，而沦为一种自我沉湎的抽象游戏。这本身才是一种迷思。对于无论何种“主义”的民主政治而言，选举都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选举大概是万万不能的。

关于以赛亚·柏林的思想

《闻道》：伯林对您的影响很大，您对伯林也一直很关注——伯林有批判过这样一种论证：“我比你更理性，你们做这个选择可能是不太对的，我就可以替你做选择”。

刘：他其实是不同意这个理论的，所谓这样一个更伟大、更好、更民主、更真实的东西，我更不同意。但是，不是说因为我不同意，所以就根本不去理会，而是需要把表达得最好的人的理论拿出来，进行辩论，论证问题出在哪里。

上面谈到过民主化和现代化问题，我认为民主化的核心是人民主权，但在操作层面上可以存在不同的形态。这种不同可以是不同形态的民主的竞争，甚至可以是争议非常大的不同形态之间（如专制与民主）的竞争，比如，从冷战时期以至现今的社会主义民主；还有一套是虚伪、不正直、不充分的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可以称为是专制。他们之间的争议要怎么来辩论呢？这是做学问的一种态度，我并不能找最差的理论来反驳问题，那会显得很容易，对方也不会服气。这个所谓的更纯洁、更强大的、思想道德上比较高的政党的来源是什么呢？事实上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不单单从这一个角度，另外很多角度也都能批判这种观点。

《闻道》：您如何看待伯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以及伯林对极权主义思想的批判？

刘：我觉得伯林遭到的误解比较多，所以需要给他做一些澄清。伯林从来没有简单的说，消极自由好，积极自由就坏，要是这样的话，就显得他太浅薄了。他的意思是，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可能被滥用，但是从历史上看，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更容易被冠冕堂皇地利用，这才是他区分两种自由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他愿意把自由这个词保留给更原生的一种体验，就是非奴役这样一种状态。他认为，自由就是可以肯定你的能力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全面发展，这样自由才会不失真，或者说它才最充分地反映人类跨文化、跨历史的一种普遍体验。而奴役和自由是相反的。

为什么叫消极自由？消极自由就是“negative freedom”，“negative liberty”，也可称为“否定自由”。第一，它从否定的方面、非奴役的角度来定义自由。自由最原生的一种体验，就是非奴役状态。不受奴役以后，还有很多很多可能性。而在这里，我最关心的是，不要让我做我不愿意的事情，不要让我处在我不愿意的状态当中，这个体验是如此地深刻、如此地跨文化和跨历史，我们必须给它命名，这个词就是“自由”。第二，自由在各种各样的含义当中，非奴役状态的描述是最贴切的。但他马上会说，自由不是唯一的价值，有了自由不一定幸福，而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有自己有利的一面和局限性。

他澄清了很多东西，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两个，一个是说有一种状态，我们需要一个词去形容它描述它，用自由来形容这种非奴役状态是最好的：我不愿意、不要逼迫我的这样一种状态。第二，这样界定的自由可以更危险地（不是绝对的）被滥用。事实上，以赛亚·伯林说，两种自由都有被滥用的可能，但是呢，消极自由的滥用比较容易识别的，滥用的积极自由貌似一种很贵重的东西，但它造成的灾难更大，所以他是出于两个理由来强调以消极的方式来理解自由。

《闻道》：您怎么看待以赛亚·伯林在 20 世纪整个政治思想家或者政治哲学家中的地位？比如，像阿伦特、哈耶克、波普尔，他们都在批判这个极权主义，伯林的独特性在哪？

刘：伯林的独特性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他是一个有哲学敏感的思想家。他常跟奥斯丁等牛津学派的分析哲学家交流，而且他最早也想当一个哲学家，但他的写作没有很强的哲学形式，而是非常注重现实感，可读性比较强。而现在的哲学写作，特别是分析政治哲学中作品，专业门槛很高，没有受过好的训练的人，读起来没那么容易。而伯林的作品，是很多人都可以读的。我始终认为，学术如果能让大家读，就是一个优点，比如，很多古典政治学家都是这样的，古希腊柏拉图的对话，它是愿意让大家理解的。有些优秀的哲学著作很难让人读不懂，但晦涩本身不是一个优点，这只是一个不得已的代价。

第二，他的知识很渊博，他知道思想史上各种各样的小故事，他的渊博和他的常识感是基本均衡的，他从来不是一个因为读了很多书就变成书呆子的人，他对现实的领悟力非常强。

第三，其实，伯林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绝不是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所谓“冷战的自由主义”（cold war liberal）。冷战是一个过时的概念，但伯林跟我们的时代依然是相关的。他有许多敏感的政治哲学洞见，是非常重要的见解。他的写作方式不是特别有条理、非常有系统，很多观点也经常看似含混、不够清晰，有时似乎前后矛盾，但是他的思想洞见在那里，像一个谜团，可以构成系统讨论的母题。因为他论述的问题不是微不足道的，

而是在很重要的问题上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洞见，它们会成为未来的话题，我认为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贡献。

我在今年会写一篇重新思考伯林的长文，来阐述我对伯林的理解。

关于现代生活的选择

《闻道》：您在文汇网“读家视野”栏目上有两期节目，“天生弱智的电视”和“网络使人变得浅薄”，但我们现在不得已要接触网络的情况下，要怎么避免在信息时代的浅薄？

刘：我认为，技术带来的影响永远是双面的，这个其实从印刷术开始就有很多人争论了，电视的好坏争论了很多很多年，现在网络也是一样。网络一定会带来双面的效果，但最终取决于我们怎么来用它。我并不同意说网络会造就一个弱智时代。

网络带来的正面意义是无可估量的。突出的一点就是，在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共同体形态。比如，一些散居在世界各地的人，从来不曾相遇，但有共同的志向或爱好，他们通过“豆瓣”之类的方式，终于可以聚成一个共同体。也许他们在周围的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但互联网让他们得以集结起来，形成崭新的共同体，这是不得了的事情，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早在 90 年代，我在美国访问过一个网站，叫做“Dear Habermas”（亲爱的哈贝马斯），就是将散居在各地的哈贝马斯理论的爱好者聚集起来。所以，志趣相投的人们不再是孤独的，不再感到相互隔离，网络把他们连结起来。而且共同体意义是丰富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或思想的交流，它还带给你认同感、价值意义、友谊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网络是很伟大的事情，怎么赞美都不过分。

当然，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同时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差异化，可以形成各种小型公社，还有一个是同质化，形成大众主流，特别表现在浅薄的娱乐、奇闻异事等等。一般说来，那些灾难性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能在网络上大肆流行，而严肃的、发人思考的事物却会被边缘化。我并不想刻意贬低娱乐的意义，但从长远来看，有令人忧虑的地方。因为现在看来，网络传媒会对一个人成长发生越来越强的塑造作用。你们这一代，在最小的时候还没有接触到这么发达的网络，你们是先形成了自己的思想和爱好倾向，然后再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所以，你们利用网络为自己服务，对你们来说网络主要是一个工具。但是对于以后的孩子，对于“90 后”、特别是“00 后”的孩子来说，网络就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作为整体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塑造了他们的成长。到最后，你可能都不知道是你在上网还是网在上你。所以，需要给你们一个朴素的警告：你需要有定力、有自觉性，你需要区别善恶、分清好坏，要成为一个明白人。一个人最终的发展是取决于他的自主性。

这里就涉及开放与封闭的辩证关系。开放是好的，但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是好的，是 *conditionally good*，某种程度的封闭实际上也有保护作用。在更封闭的社会里，因为它有很多现实的层层障碍，你想做什么都难，做好事难，但做坏事也难。比如，交通不发达，你想去赌场就不太容易，而现在你要去澳门的赌场是很容易做到的。理论上，现代每个人都可以过花天酒地的生活，但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社会由于开放和发达，造就了无数堕落的机会。这个“堕落”是非常广义的，包括思想的堕落、变得平庸、变得随波逐流。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考验，外在的规制越来越弱了，对人内在的自律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开放社会好的一面。你在这个时代生活，做一个具有精神境界的人，是更为“高贵”的（我们可以用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你完全是自觉地、自律地，而并不是由于受到外在的限制，不得已、“被迫地”做一个好人，所以你“选择”了做一个好人（这个“好人”很宽泛，道德上的好或精神气质上的好），那就是一个真的好人。比如你热爱知识，那你一定是真的热爱知识，因为以前可能没有别的出路，没有做生意等等其他的机会，你就被迫读书，连自己都分不清是因为我要读书，还是我不得不读书。而现在这个世界允许一种“本真性”（*authenticity*）的理想。就是说，你内心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你有比以前更大的机会成全自己，成就自己内心真实的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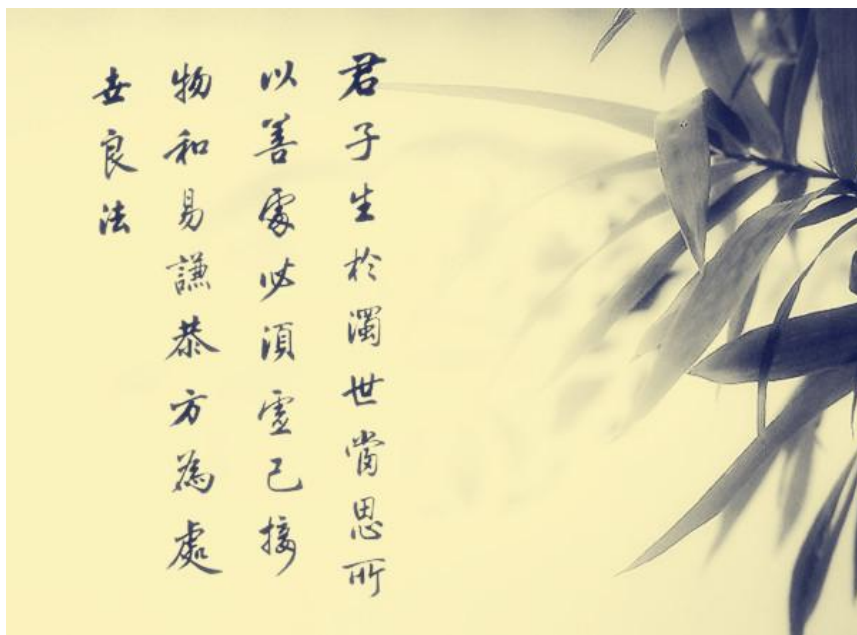
所以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说自己容易变得弱智、肤浅、随波逐流，是因为你放任自己，沉浸在无聊的东西和傻笑中，这在精神上的确会让你处于一个很涣散而“舒服”的状态。使你精神懒散，你不愿去看追求深刻的东西，不愿去克服障碍而获得快乐。但悖反之处在哪里呢？因为人类许多深刻的快乐和喜悦，都跟征服、挑战、超越自我有关系。现在已经有这么多拍摄极好的风光旅游片，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去旅游？风光片的视角可以是航拍、也可以水下摄影，威尼斯、地中海、埃及等等，都可以比你亲自看到的要精彩，要是你觉得不够真切，还可以用 3D。但这无法代替我们亲身体验。因为亲临现场是需要自己的努力，也许还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跋山涉水。惟其如此，我们得到的那些快乐才更深刻、更持久。看风光片和亲身体验的旅游，看电视体育频道节目和自己在球场上打篮球，这两样东西是一样的吗？我们往往想用更容易的方式（*easier way*）来生活，但这样生活可能带来另一种缺乏，一种不满足。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时代，可以有无数多的生活可能性，而且在这些可能性中，有很多是平庸而方便的方式。就像微博读久了，阅读被浏览所代替，有的时候连 140 字都不耐烦了，最好只有几个字，配一张图。可是，你花了三个小时刷微博，每个时刻你似乎都津津有味，但当你关上电脑后，你可能会感觉似乎什么都没读过。我们并不是说低层次的快乐没有意义，

我甚至认为，完全没有“低级趣味”的生活是很恐怖的。只是告诫大家，不要沉湎于低级快乐，否则就容易陷入无止境的平庸，丧失了本来可能抵达的人生境界。

所以，在这个充满诱惑的时代，自己要做一个清澈的人，明白自己要的是什么，什么是自己值得追求的。生活有高低之分，这里说的并不是阶层、财富的高低，而是存在精神价值意义上的高低。从低到高这个追求过程中，你能获得更深刻的快乐。这些道理并不深奥，实际上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体悟。这里没什么相对主义。柏拉图是对的，你在爱的阶梯上攀登，会体验到无与伦比的、不可复制的伟大，那是你在零星的、平庸的生活中体验不到的。深刻而有意义的快乐往往是独一无二。这造就了你的个体性，形成了你个人的标志（personal signature）。

（采访、编辑：曾乔圆、吴途勇、孟舒）



全球治理研究大有可为

——为什么中国最终接受和拥抱了全球治理？

庞中英

核心提示：庞中英是中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和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从事研究工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代表性成果有《权力与财富：经济民族主义研究》、《地区主义与民族主义》、《全球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全球治理》、《中国与亚洲》、《中国与联合国维护和平行动》、《世界大国与正常国家》、《全球化、社会变化与中国外交》等，本文是编辑部向庞教授约请的特稿，对庞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我们写稿表示诚挚的谢意。庞教授目前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亚洲和非洲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政策分析。

与“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永续（可持续）发展”等外来的概念一样，“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概念在中国的旅行是一种独特的国际过程：在20世纪90年代，本土学者就开始从西方主导的国际知识体系中引入这类概念（比如，已故全球治理研究大师、美国世界政治学教授 James N. Rosenau 和德国著名学者、法兰克福国际和平研究所的创始人 Ernst-Otto Czempiel 合编的《没有统治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迁》（*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一书，该书被很快翻译为中文出版，可惜该译本却把 government 仅译为通常的“政府”，没有反映出西方治理学者给它所赋予的“统治”的含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本地社会（如媒体）事实上在经常和频繁地使用（包括滥用）这个概念。最后，是执政党及其政府对这一概念的态度变化，从一开始（非正式）的怀疑、警惕、拒绝到最后谨慎研究、判断、接受而且大力提倡和主张这类概念。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研究的演变过程。

2012年11月8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锦涛在18大做的报告中提到了全球治理，包括“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与此在2013年3月5日举行的第12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上，前总

理温家宝提交的最后一部《政府工作报告》中，尽管没有用全球治理的字眼，却提到在过去5年（2007—2012）间，中国“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这些官方文件说明，在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与实践中，“全球治理”已经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

此前，一些重要的中国政府文件也包括了全球治理的内容。例如，2011年3月1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第53章就是《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官方第一次正式使用“全球经济治理”的概念是在2009年7月9日举办的最后一次“8+5”峰会（在意大利拉奎拉举办）上。这次特别峰会因国内原因胡锦涛主席突然宣布取消出席，改由国务委员戴秉国出席。在这次发言中，戴秉国“分别就全球治理的目标、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方式和治理的机制等方面进行了阐述”。^①顺便提到的是，此前的2009年6月17日，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在北京华风宾馆举行了内部小型研讨会，邀请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学者就全球治理问题进行研讨。从上述戴秉国在拉奎拉的讲话中可以看出，那次研讨会上学者们的关于中国对待全球治理的态度的一些建言得到了采纳。

与“国际治理”相比，“全球治理”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变革。不同于国际治理，全球治理强调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小而穷的国家在解决全球问题中的国际机制和制度中的代表性，要求不要忽视他们的利益，同时，全球治理主张和接受更多的非政府行为体和公共（私人部门等社会）力量的介入。尽管如此，人们容易严重忽视的是，20世纪后期的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个非激进（non-radical）的概念（如果我们不愿意说它是保守概念的话），因为全球治理并非要挑战国内和国际“现状”（status quo），而仅是协助改善“现状”，即面对“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这也就自然反映了全球治理的局限性。^②

“现状”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包括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处境（包括生存条件）以及不同的利益出发，对“现状”的理解都不会一样，并且会差别很大。比如英国控制下的阿根廷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叫福克兰群岛）的“现状”，阿根廷和拉美多数力量的理解与英国官方和那个群岛上的英国居民的理解就是不一样的。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者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奈（Joseph S. Nye, JR）共同指出：全球治理“与民族国家作为根本政治组织形式并不矛盾”。全球治理“如果它不取代国家治理，如果它侵

^① 新华网意大利拉奎拉2009年7月9日电（记者：王星桥、刘东凯），“戴秉国出席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

^② 至于关于全球治理的各种各样的局限性，学者们见仁见智。其中，英国学者 Jim Whitman 以此为题有专门著述：Jim Whitman, *The Limits of Global Governan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入国家和社会自主权的目的仅在于推动合作，那么全球层次的治理可能就是可以接受的”。并且为了解决全球治理中的“信任问题”——“民主正当（合法）性”问题，他们提出了“网络性的最低纲领”（最小化主义）。^①

受基欧汉和奈的启发，我认为，所谓“现状”可能代表了如下三点：

1、民族国家在形式上和内容上的继续。主权等现存国际体系的原则及其存在和实践即“国内治理”仍然是基本的治理形态，并不因为全球治理的兴起而取代国内治理，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治理不是世界政府”，尽管“世界政府”的思想在全球范围的危机年代一再被人们想起和呼吁落实。^②

2、西方主导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机制（规范、制度），而不管那些机制（如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金融机构）是否起作用（工作），尤其是不管在解决当下的问题和危机上这些机制和机构是怎样的无所作为和无能为力，但它们依然有存在的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在“改革”联合国安理会（UNSC）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问题上，西方尽管同意让出一些权力（主要来自欧洲一些中小国家），但美欧不会放弃对这些机构的绝对控制。

3、如同中国国内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完善中国国内的制度一样，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的被叫做“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运动或者“全球生活”（global life），^③即“全球化”浪潮因为全球治理（例如G20）而变得更加完善。这如同上面提到的奈等人主编的书名所示，全球治理是对“全球化世界的治理”。

2008年美国 and 欧洲先后陷入金融危机后，出现了诸如“管控全球化”向“金融和资本交易征税”等“反（当代的）全球化”的激进观点和主张。这类观点和主张其实与上述“原教旨”的、非激进的全球治理（对全球化只做一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管理）已经不同。在全球化几乎主要是以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等金融势力为核心的全球化下，全球化一旦真的被管控起来，甚至由此停顿下来，就完全不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初衷。这就是为什么在诸如G20的进程中，“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拒绝和抵制这类全

^①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导言》，收入约瑟夫奈和约·D·唐纳胡等主编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一书，该书中文本由王勇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2—13页。

^② 见庞中英：“全球政府：一种根本而有效的全球治理手段？”，《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

^③ “全球生活”一词出自James Rosenau。见James N. Rosenau, “Governance,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 eds.,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8.

球治理变革。

当然，现存全球治理在形式上没有直接挑战国家的主体权威，但在实质上，全球化早已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国内治理。有关这一主题，非常复杂，需要很多其他另文的讨论。

中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进行了“改革开放”，其中的一个外部“有利”因素正是英美先于中国“改革开放”而推出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当中国的“改革开放”遇到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两者甚至有点相见恨晚，结果，改革开放和新自由主义相互作用，中国最终接受和拥抱了“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全球治理是新自由主义为管理其产生的“外部性”(externality)而引进的必要元素(类似古典自由主义的“守夜人”)。这一点解释了中国最终接受和拥抱全球治理的一个主要原因。

除了这个大的因素外，中国接受和拥抱全球治理还有其它原因。这里，我仅指出如下的两条：

第一，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竞相推出诸如新的“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措施(如超量印刷货币，欧洲央行去年 9 月作出无限量购买公债的决定发动巴西等国家指责的“货币战争”)，而 G20 等“危机管理”的国际(政府间)合作的地位似乎上升，意味着，在全球治理中国家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增强了。这一点正与中国的治国理念甚为契合，因为，在中国，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尽管进行了很长时间，但是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介入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

第二，全球治理的着眼点在于国际合作和对全球发展的贡献等积极的目标之上。当中国接受和拥抱全球治理时(2009—2012 年)，外界认为中国外交(政策)会变得咄咄逼人(assertive)，但在国内却认为中国外交(政策)很“软弱”，两种差别很大的论调同时甚嚣尘上。结果，中国自己也觉得很委屈，中国在国际上并没有谋求改变“现状”，即使是钓鱼岛问题，也不过是希望日本能够回到谈判桌上来，承认有这么一个争端而已，并非要打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现状”。而在这个时候，中国恰巧发现了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确可以帮助中国改善自身的国际形象。

仍旧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其实目前的实际(真实)状态是：并不在全球治理，而是刚进入国际治理，距离全球治理实际还远得很。不巧的是，中国却用了“全球治理”。中国官方在讲目前以欧美为中心的金融危机时，从来使用的是“国际金融危机”，一般官方文件和媒体中找不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说法。这正好是中国仍然在世界观和外交实践上处在国际治理中的最好注脚。

但西方，尤其是欧洲，却欲实现“从国际治理到全球治理的转变”。^①尽

^① Tanja Bruhl and Volker Rittberger, "From international to global governance: Actor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world of the twenty first

管如此，考虑到中国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从来就天然地具有某种模糊性和灵活性，这种不区分国际治理与全球治理，即把国际治理说成是全球治理的“公共”话语，为中国有朝一日最终重新理解全球治理提供了某种方便条件。

“全球治理向何处去？”是笔者 2011 年 11 月 15 日举办的一次国际研讨会的题目，当然，那次研讨会的与会者（主要是来自中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并未正面触及和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即使放到世界其它角落，不同的人对此将有不同的回应，大多数回答者可能都不会有明确的答案，因为人们对全球治理的理解、接纳和态度并不同。

写这篇文章时的 2013 年 3 月 15 日，美国和欧盟已经决定要在 2013 年 6 月正式启动建立美欧（跨大西洋）的自由贸易（US-EU free trade）的谈判。如果向来主张全球的多边主义（多边体制）的欧盟也因为急功近利要退而其求次，即便是非激进的现存全球治理也肯定将进一步倒退或者陷入更多困难中，而不是稳定前行。当然，有的欧洲学者认为，欧洲如此追求流行的双边和小多边安排会伤害全球的多边主义，不符合欧洲的根本利益。^①这类不同意见最终可能会为欧美自贸区等类似的安排投下变数。

中国在现存全球治理降温的时候却开始“参与”全球治理，这对于全球治理的未来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究竟是意味着由于中国的加入而使既存的全球治理继续被推进？还是中国的加入和增大的贡献其实（如对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并不能让这些机构焕发活力、脱胎换骨或者起死回生？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要面对的巨大问题是：中国到底如何理解、对待全球治理？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责任编辑：王亦冰）

century”,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Berlin）所长马塞尔·弗拉泽：《欧美自贸协定弊大于利》，见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文章，在下述地址下载：<http://www.ftchinese.com>



2013 年新年伊始，当人们度过元旦假期开始了新年的工作时，一场关于《南方周末》2013 年“新年特刊”出版事故的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吸引了众多网民的眼球。一时间，各方观点、意见激烈交锋，形成近乎对立的声音。先不谈这次出版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它的背后究竟有怎样的故事，关于它的主题“家国梦”却是当前这个时代颇为值得讨论的另一个话题。

梦想一直是支撑人们探索 and 奋斗的不竭动力。正如《南方周末》2013 年“新年特刊”的主题“筚路蓝缕，不懈不止：家国梦”一样，千百年来，我们的祖辈们都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点一滴地做着漫长的探索。这样，才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不同人有不同人的梦想，但是时代背景或多或少的对人们的梦想产生影响，并汇成一个时代的主流。

目前，关于新时代“中国梦”的讨论渐趋热烈，我们也的确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是否需要新的梦想，这个新的梦想又是什么，它会将我们引向何方？诸多问题冲击着我们的思维，冲撞着我们的大脑，将我们带入深层的思考中。

一、我们需要新的“中国梦”吗？

去年十月份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需要提出新的‘中国梦’”的评论文章。文章称中共新领导人将面对两项非常不同的挑战。他需要确保共产党继续执政，而这进而要求实现更多的高增长，以便保持民众对共产党统治的满意度。同时，他也需要应对高增长带来的所有负面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从农村到城市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令人窒息的污染以及环境破坏。解决这一切的唯一途径就是推出一种新的“中国梦”。“中国梦”的再一次被提出并引起国内外如此大的重视与中国当前的发展局势不无关联。

——章庆慧

《我们是谁？》这是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一本著名著作。笔者以为，在当今中国，我们也面临着这样一个哲学命题的拷问。中国当今正处于一个大转型的时期，其显著特征为既面临着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又面临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社会思潮，不管是新的，抑或是旧的，全都交织在一起，人们的思想也处于一个多元并存的格局。我以为，中国梦的建立，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又将要向何方去？”等诸多哲学命题的一条途径与思路。

——陈邹斌

西方学者和媒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敏锐的问题意识，一直以来成为部分国内人士了解中国问题的信息来源。美国媒体的这则评论文章指出了中国需要提出新的“中国梦”的理由，即我们党需要继续从经济增长中获取执政的合法性和民众的认同，同时需要解决高增长带来的问题。这就是当前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成就的同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新的时代背景必须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中国梦”，重新塑造“中国梦”，因为这是不断探索的源泉，是不断奋斗的动力。

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和新的时代特征也决定了人们错综复杂的认知，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和中国人也迫切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梦”。它必须回答中国和中国人现在的身份认知和自我定位；它必须能够回顾中国五千年来的发展史，尤其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求独立、奔富强的卓绝探索之路；它必须像那黑暗和迷途中的灯塔一般，照亮前进的道路，指

引前进的方向。

二、“自由梦”“宪政梦”的思考

如果说中国梦是自由梦是宪政梦，那么现时中国的各种力量，又该在这个梦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显而易见这个问题难以回答，因为今天的中国依旧处在一场变革之中，在这种变革中，每一个阶层所起作用，所代表的内容都不一样，而单纯地将变革甚至自由的责任托付于一个行业甚至一种媒介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的序言中写道：“2000 年我从哈佛退休时，决定专注于研究在我看来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1978 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弄清楚了这一点，营建一个新的中国梦，才成为可能。

——李沁笛

2013 年的南方周末又提出了宪政梦，似乎政治上的民主与法制已经是中国梦的重点了。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改革的迫切性也是因经济发展的需要。但不管怎样，如今提到“中国梦”一词，我联想到最多的是政治方面了。

——章庆慧

中国梦，自由梦，宪政梦。这是《南方周末》2013 年“新年特刊”献词的初版。部分学者认为，中国目前处于“有宪法，无宪政”的状态中，因此，根据欧美宪法学之意，我国部分宪法学学者提出了“预备”宪法学，其言下之意是“八二宪法”未能“活”起来，需要一种司法化的机制将其唤醒。因此，他们提出，只有向前看，才能解决“预备”问题，只有向外看，才能解决“活起来”的问题。具体来讲就是要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和进行宪法的司法适用。

也有学者从宪法“管全局”、“管长远”的性质出发，对中国“宪政梦”做出了其他的解读。他们认为，所谓宪政就是最高的政治。最高政治权力由谁来掌控，落实到实践中就是由谁说了算，这是观察中国宪政运作的理论视角。因此，如何实现最高政治的统一领导才是中国的宪政问题。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指出，邓小平即便在痛陈权力过分集中的情况下，仍然认为一个强大团结的领导班子更重要。这或许又可以拿来为这些学者

所引证。

三、本土化视角的“中国梦”

世界越来越小，在世界村里我们变得太容易交流，太容易了解不同国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容易比较。中国是世界的，但中国梦是中国人自己的！对中国当下不满的国人，大多何尝不是立于横向比较来谈论国是？以西方之优良讽中国之低劣，而无视纵向的鸿沟差距。

应该承认，国内种种让人愤懑难抑，国外历历也使人倾慕不已，但当你仰望天空的同时请记得脚踏实地，当站在外国人的视角评判中国的时候请别忘记你还有个中国人的视角。

——蔡一麟

横向地中外比较恰似那仰望星空，但梦想最终还是要落到脚踏实地的具体事情上。党的十八大闭幕后，有学者发表微博阐述了他未来的十大心愿：不用到海外买奶粉；能在超市买到安全食品；白领不再沦为房奴；环境污染不再恶化；贫富差距不再扩大；企业家不再忙着移民；裸官不再增多；股市告别圈钱机器；不再“拼爹”；对公权力的约束取得显著进展。这条微博引发了广泛共鸣。综合该微博中的内容，我们用“实现正义”就可以涵盖其内容，这包括了，人们享有安全感、平等、公平、政治透明等。因此，在实际层面上看来，“中国梦”就是过上为正义所庇护的生活的梦想。这就是站在中国人自己的视角上，落实在具体现实中的“中国梦”。

【结语】

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独特梦想；每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价值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的梦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相互碰撞，擦出时代的火花。面对新旧交替所产生的各种问题，那最迫切的梦想莫过于民主法治的建立，公平正义的实现。只有实现了这迫切的梦想，更高的梦想和目标才有了基础。现阶段这迫切的“中国梦”，将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来源，引领我们走向未来。

（责任编辑：柴捷）

话语·幽默

1. “大家普遍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力，这一点也不错。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历史，许多成功的改革，都是革命斗士、既得利益者推动甚至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者不能变成改革者，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亚布力论坛上发表演讲

2. “行贿是一种存在的现象，否认它是没有用的。当你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时这些都是必需条件。”

——意大利大选在即，丑闻缠身的总理候选人、前总理**贝卢斯科尼**公开为意大利商界领袖的贪腐辩护。意民调显示，没有一个政党或者联盟能在大选中完全获胜，意国或因此陷入乱局

3. “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忘记他们的英勇和自我奉献精神。”

——**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胜利 70 周年招待会上说，俄罗斯坚决反对歪曲二战历史事件，反对出于政治目的重新审视这段历史

4. “在某种意义上，春运就是在利用一个混乱低效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

变命运的必要性。”

——语出学者**朱大可**

5. “为什么我没有看到一个获奖人是快乐、幸福、富足的？仿佛‘中国式好人’就应该是苦人、穷人、累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蒋术**发表微博称央视的《感动中国》节目太过苦情

6. “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2012 年 2 月 25 日，执政党新国家党领导人**朴槿惠**就职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7. “即使是在以社会流动性良好著称的瑞典，在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也有约 70%—80% 的家族社会地位得以代代相传……对英美两国三代人的数据分析表明，一代人的高收入水平会使至少两代人受益。”

——《经济学人》文章指出，调查发现，可能要花上三五百年，才能使上流家庭与普通家庭的后代在各项收入上有平等的机会。“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一过程，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漫长得多

8. “当与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的同龄人比较时，自尊心会受到打击，这是负面影响的最大原因。这个观点似乎有点老套，但是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自己的大学室友或者读麻省理工大学的堂兄弟所获得的成就，你就不会感到焦虑。”

——《福布斯》作者**莫林·亨德森**发表文章《2013 年该戒掉社交媒体的三个理由》说

9. “在经得起各方面专家检验、经得起民众质疑的结论出来之前，把一个做炮仗的抓起来问罪，本身就是一种问责情绪化的表现。”

——河南连霍高速宜昌大桥坍塌后，有人说网友的质疑是一种情绪化的表现。网友刘雪松遂有此说

10. “北京早上好!!! 到北京 5 天才看见北京!!!”

——雾霾之中



上海漂浮死猪事件后，猪肉和食品安全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责任编辑：杨骐铭）

古都金陵

蒋欧悦*

三月的风吹过，带来了秦淮河边湿润的气息，带着花香和脂粉，飘过我的窗前，轻轻撩起窗帘，撩醒我的一床懒梦。

这里是南京，这里是古都金陵。

走在南京的街头，最强烈的是迎面而来的历史气息，不用别的，单单道路两旁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就是一段历史的证明。当年蒋校长与宋美龄新婚燕尔，为着一句喜欢法国梧桐，便将这城市道路两旁都植上了法国梧桐，如今，漫步在城市中，便有浪漫的诗意迎面而来。夏日里，太阳正辣的时节，走在树下，阴凉之意令人不禁心爽，就算是天降大雨，也可在林荫道上暂避风雨。仿佛这一城的梧桐树也是有情的，将城市里的人们掩护在它的怀抱中，没有风吹日晒，没有雨打水淋。

法国梧桐怀抱下的城市，这里是古都金陵。

前两年有部名叫《南京，南京》的电影，近两年又有一部名叫《金陵十三钗》的电影，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情怀，不同的导演，不同的风格，叙述的，却都是那段催人泪下的历史，那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屠城的故事。撇开历史真伪性不谈，这个事件似乎已经成为了南京城的烙印，成为了这个城市悲伤历史的一部分。《南京，南京》里，画面似乎永远只有黑白两色，初看像默片，无声的悲哀，无声的挣扎。后来有声音了，大提琴沉沉得声音，仿佛低沉的哭诉。一些听不大分明的方言，一些晃动不安的镜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动荡环境下一些平凡百姓的故事。

拉贝提着行李箱走过铁栅栏，唐先生和妻子紧张地递过良民证，“拉贝先生只能带一个助手及家属。”有人提醒。“我知道。”唐先生的回答很简单，他是在回避，他和妻子走过铁栅栏，亦步亦趋，唐先生不安地回头，眼睛盯着被拦截的那位朋友，最后，他停下了脚步，转身，对妻子说：“你先过去吧，我在这儿顺便找找小妹……”一个决定在他心中形成，在最后关头，

* 蒋欧悦，南京大学历史系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他无法容忍自己的贪生怕死，晚点再见，意味着永远不见，周氏紧紧地握着他的手，“不要，孩子需要你！”她的眼睛在说。唐先生松开妻子的手，抚摸着周氏微微隆起的肚子，脸上满是不舍，然而，他什么也没说，默然地走过铁栅栏，朋友向着生命走去，周先生走向了无底深渊。“我妻子又怀孕了！我妻子又怀孕了！”唐先生大声地说。周氏跑了过来，隔着铁栅栏，两人泪眼相对，“以后每个月的工资我还是会交给你！”唐先生颤抖着说。“自己吃东西要小心！”周氏说。她已泣不成声。大屏幕上，两只泪眼……平常的对话，却有不平常的意味，就是这样的琐碎对话，是战争岁月里多少人梦想的生活。

《金陵十三钗》则讲述了一个女性之间的故事，十三个风尘女子换了十三个纯洁处子，同样是灰暗的岁月，却多了几分色彩。书娟透过教堂的彩色玻璃，第一次看到了秦淮河边的女子，也许，在她小小的世界里，这是第一次那么近距离地接触到了传说中的她们。她那么认真地看着，窗外是女性的嬉笑，而窗内是一片纯净安静的世界，两者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阳光照在彩色的玻璃上，五彩的光照在书娟稚嫩的脸上，世界第一次向她展开，不掩饰自己的精彩，也不掩饰自己

的丑恶，像光的色彩，不管黑色还是白色，一股脑儿都倾泻在她的脸上。最后的结局，交代得不甚清晰，不知道玉墨她们是不是遭遇不幸，不知道书娟她们是不是成功脱险，电影省去了后面的情节，不管是谁，在那样的岁月里，遭遇的大多是不幸和苦难，不管是逃脱的还是没有逃脱的，等待她们的，大概也净是流离失所和惊慌失措。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永远被凝固在了时间的长河里，成为无法触碰的伤疤。

这里是悲剧的河流，这里是古都金陵。

再往前看，便是六朝古都的凄楚。李白名诗《登金陵凤凰台》写道：“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仙的风采如今只能在只字片语中找寻，而凤凰台与白鹭洲、三山与二水今日仍能在南京城找到踪迹。三山为古山名，今日的三山街即为其旧址，明初朱元璋筑城时，将城南的三座无名小山也围在了城中。这三座山正好挡住了从城北通向南门——聚宝门的去路。恰逢当时正在城东燕雀湖修筑宫城，于是将这三座山填进了燕雀湖。三山挖平后，在山基修了一条街道，取名为三

山街。“二水”指秦淮河被白鹭洲一分为二。白鹭洲为古代长江中的沙洲，洲上多集白鹭，故名。今已与陆地相连，位于南京水西门外，已辟为白鹭洲公园。该园在明朝初年是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家族的别业，故称为徐太傅园或徐中山园。后徐达后裔徐天赐将该园扩建成当时南京“最大而雄爽”的园林，取名为东园。该园成为园主与王世贞、吴承恩等许多著名文人诗酒欢会的雅集之所。明武宗南巡时，曾慕名到该园赏景钓鱼。入清以后，因不断受到战火与人为的破坏，以致景物凋零，园林萧瑟，一代名园已成遗址。民国期间，南京市政府于1929年将该处建为“白鹭洲公园”。如今坐地铁去夫子庙秦淮河一带，便在三山街站下车，似乎李白古诗中的一连串地物名词，已经成为了南京百姓口中日常的名词了，这就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底蕴。

当年诗仙登临凤凰台，看到层林尽染，秦淮河水东流，大概是意气风发无限愁的，南京是个令人惆怅的城市，在几百年前也是如此，满眼的城市景观已经隐去，浮现在士人脑海中的，只有故国、吴宫这些字眼，代表了曾经兴衰的历史，代表了在这片土

地上生活过的一代人，他们也有欢笑，也有泪水，也曾歌咏过，也曾哀叹过，而如今，这一切都随着一个王朝的衰落而永远埋藏在泥土之下了，只有秦淮河畔的红桃绿柳，可以印证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那些随风而逝的故事，随风而逝的人，只有它们记得。

这是一个令诗仙李白牵肠挂肚的城市，这里是古都金陵。

南京的市花是梅花，或许因为花容端庄静雅，傲霜迎雪，凌寒独放，自古便是文人雅士歌咏的对象，用它来形容南京这座城市，是再恰当不过了。二月，梅花山上的梅花便开始陆陆续续的开放。有的红得深些，有的浅些，深深浅浅，构成了一幅绝妙的水彩画，远远望去，仿佛满山的暮霭。画家魏紫熙画过一幅名叫《南京梅花山》的国画作品，画面中，成群的儿童从山上走下，一条小路从梅花群中蜿蜒而下，孩子们拉着手风琴，带着红领巾，一副六十年代的景象。

三月，到鸡鸣寺，会看整条开满樱花的街道，看千年古刹在新开的樱花树后端庄地矗立着，历史与生命的交会，会让你感觉到时光的错愕感。日本人钟爱樱花，因为樱花有瞬间绽放的生命，而在这短暂的生命中，她们尽情地绽放，不管

时间长短，然后，一阵风吹过，她们像飘落的雨，将陨落的生命付诸大地。人们爱她的美，虽然生命短暂，但用尽全力努力地绽放。

四月，便可以到莫愁湖看海棠花了。张爱玲在《红楼梦魇》中说，平生有三大恨事，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三恨红楼梦未完。可见海棠的美，即便无香，仍可以让人牵肠挂肚的思念着。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写道：“昌州海棠有香，今不可得；其次西府为上，贴梗次之，垂丝又次之。余以垂丝娇媚，真如妃子醉态，较二种尤胜。木瓜似海棠，故亦称“木瓜海棠”。但木瓜花在叶先，海棠花在叶后，为差别耳。别有一种曰“秋海棠”，性喜阴湿，宜种背阴阶砌，秋花中此为最艳，亦宜多植。”明代仍有海棠带香，然今人已未曾听闻，甚至大部分人连海棠的品种都认不

全了。红楼梦中有西府海棠，闺阁之中，得此好花，并吟诗弄赋，想必也是件美事。苏轼有诗《海棠》，写道：“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海棠开在春季，必然给人美人春睡的遐想，宋代王淇有诗《春暮游小园》，“一从梅粉褪残妆，涂抹新红上海棠。开到茶糜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如此美好的意象，只有在诗人笔下，才会越发出落得可爱。

这里小园自留恋，这里是古都金陵。

在这里生活五年了，古都的美才逐渐显现在我的面前。这是一座敦厚的城市，朴素而内敛是南京人的性格，或许，正是前年的文化积淀，给了这座城市如此的性格。

（责任编辑：李沁笛）



探访浪速之城

——大阪

蔡一麟*

展开地图，你先看到的是蔚蓝的汪洋和翠绿的陆地，但最后吸引你眼球的会是那密密麻麻、星辰密布的点，也就是城市。每个城市都



是特别的，不单是数学意义上简单无二的一个点，他们中每个都有自己所谓的唯一……

此前暑假我与几个好友结伴去了日本，所见所闻颇多，实有与大陆迥异之感，每个城市所彰显的风格亦是如此。这里，我以异国外乡客的视角述说下古风新生的浪速之城。

浪速是现在大阪的古称，其他

还有浪华或难波。其城名得自日本史书，据说神武天皇乘船自九州向东航行巡视，到现在大阪附近，水流湍急，浪花翻滚，故将此地称为“浪速”，而浪华或难波同浪速的意思相近。

大阪作为历史古城，加之当地的高端重视，存留的文化古迹可谓不多，其中最富盛名的就是大阪城。大阪城始建于日本战国，由丰

臣秀吉所建，之后在战火中损毁，直到昭和年间才又重建。现在大阪城周遭建成为大阪城公园，公园由几道护城河道环绕，相传护城河道始自丰臣秀吉时期，原有5道，以大阪城为圆心，呈同心圆状一圈圈发散向外，之后被德川家康填平，重建时复又挖掘而成。大阪城所在是公园里的本丸地区，先循护城河沿岸踱步，夹道皆古松、樱树，只可惜花期已过，不然漫步于散落的樱花之中自是一番风致。

辗转至大阪城外墙正门，让我

* 蔡一麟，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吃惊的是其大门的简朴甚至于简陋，古代中国一般的大户人家也比之精致。走进迎面就是一面石壁，解说牌上说是当年建城大名所献的巨石，因其巨大十分稀有故而置于此处展示。不得不说日本在恢弘气势上远不如中国诸多巍峨建筑，然而相对的他们在建筑雕琢上可谓极尽心思。大阪城里的主体建筑就是天守阁，如今被视作大阪的象征。其远望，碧瓦白墙，浑然矗立；细观，城巅八鯨，惟妙惟肖，天守阁各处都有金箔雕饰，将军幕府气派自然天成。

早已习惯于中国雄伟建构的我不禁就为大阪城之精巧而侧目。在我们频频拍照留念时，当地人不时会主动上前询问是否需要帮我们照合影，而且相当认真，拍到我们和他都满意方可。大阪城公园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更是一个当地人平时散步休憩的场所，环顾四周有许多老人安坐在椅子上，或闭目小憩，或喂食鸽子，或阅读报纸，安逸悠哉的气氛也让大阪城少了些许旅游景点的功利，多了许多欣赏的静心。

其实，之后去的几个景点也是这般，不像中国这儿景区里当地人几乎没有，那里当地人走动的十分多，另外时不时还会碰到一些学校学生的修学旅行，老老少少和我们

异乡客夹杂一道，东看看西瞅瞅，这样才是真正的旅游。

在感受历史古风的同时，大阪吹起的时代新风也让人印象深刻。

心斋桥，位于大阪南部地区，是大阪最大、最知名的购物区，距今已有 380 年历史。在弧形天棚下长长的商店街里，集中了众多的大型百货店和服装、鞋类、珠宝、时尚服饰专卖店。站在入口，向着深处遥望，竟望不见尽头，里面人头攒动，商品琳琅满目。然而，原本便不谙逛街的我，在上海商圈已然眼花缭乱，此时于心斋桥更是昏头转向……

这里补充一点，无论人潮涌动的商业街还是游客如织的旅游景点，地面上没有些许垃圾烟头还是让我很震惊的，说是震惊一点也不为过。说来也好笑，我们走在这样的路面上反而有些无所适从、不自在了。

从心斋桥劫后余生的我们不觉也饥肠辘辘了，这时只要转个弯便是远近知名的美食一条街——道顿堀。日本就有“吃在大阪”的说法，其中道顿堀便是大阪人所谓“吃趴下”饮食文化的发源地，举目就能看到的大螃蟹雕塑招牌更是道顿堀的标志。许多著名的小吃，像豚骨拉面、章鱼烧、旋转寿司、河豚肉等，在这儿都可以吃得到。

里面最为闻名遐迩的就是章鱼烧了，粘而不腻的表皮、劲道十足的章鱼肉，再撒上些鱿鱼干、淋上点佐料，那口感真的是没话说。其次便是豚骨拉面，吃下来最好的一家是金龙拉面，面本身够味不说，那汤底熬煮得相当入味，国内味千拉面差之千里。

道顿堀以其旁流经的运河——道顿堀川而得名，两岸完善的市政建设也将其建成了一个极佳的市区自然环境，风景相当不错。尤其是当夜晚来临，闪烁的霓虹灯更是诱人，再与道顿堀两岸的室外广告连成一片，倒映在运河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泛着宛如星辰的光谱，交相辉映，五光十色，甚是华美。

既然是探访浪速之城，自然不会老实地守着旅游地图按部就班，我们几个晚上回宾馆稍作安顿便早早地潜了出去。吃货的我们，一边欣赏着夜景一边寻觅着下一个地点，先进了一家文字烧的小店，大阪文字烧也算是相当有名气的。虽说是小店但请绝不要等同于中国这边的兰州拉面，当时的我们就是这么误会的。进去才发现小店里面的装饰十分讲究，也不是说奢华，而是能让人马上感觉到店家独到的心思。之后我们去的居酒屋也是，老板估计是六、七十年代动画的爱好者，墙面上都挂着那个时代片子

的海报，现在已是绝版的了，餐桌旁边有几排书架上面都是动漫杂志如《少年 Jump》，供客人取阅……这样的店我们自然算是初体验的了。

唠唠叨叨说了不少，不知不觉也写了许多，本想就大阪这个城市写的，不由得就扯到了其他。对于大阪，我作为异乡旅人不过是一个过客，所看到的或许尚在表层，但我在那座城市所感受的人和物，与心中所泛起的涟漪却是切实的。

也许，每一座城市的特别也就在于心的触动，浪速之城对我便是如此。

(责任编辑：崔攀)



“群体无意识”

的民意

——读《乌合之众》

黄钰钧*

读完勒庞的《乌合之众》，不由感慨作者的先见之明，尽管他有些观点在现今看来过于偏颇，但他对于公众心理的把握不管在过去或者是现在仍然具有积极意义。“群体无意识”的民意始终存在于不同性质的社会中。

“激情杀人”、“70 码”、“不管你信不信我反正是信了”、“小月月事件”等等这些流行词汇或者语句背后都有着相对应的公共事件。这些事件所反映的都是公众情绪，这些公众情绪自古以来就在群体中存在，公众情绪所代表的是民意。这里所谈到的群体，不仅仅是指单单地聚集在一起的个体，更多的是由于某些原因或在某种既定条件下汇集在一起的一群人。这些形成群体的个人，自我个性会消失，感情与思想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形成了群体心理。对于公众这个群体而言，这些也就是所谓的公众情绪，

代表着公众的民意。在最近的 10 年时间里，随着一系列的事件，国内的公众情绪力量兴起并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成功加入世贸组织、申奥成功、SARS 的爆发……这些或成功或危机事件都让中国社会生活有了一个庞大的关注点，互联网在 2001 年之后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这也为公众言论表达和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民意可以通过这个平台进行表达，公众的情绪也可以在此进行宣泄，人们似乎发现，这个表达的平台所积聚的强大民意，可以对抗无处不在的政治权力。

强大的民意被执政者所注意到并使相关政策发生改变是在 2003 年——当时备受关注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莫名其妙地死在了收容所内，当时负责为孙志刚申冤的律师凭借着公众情绪表达出的民意和媒体的力量，为孙志刚事件上书全国人大，《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除了，孙志刚事件也成为了中国法治历史的里程碑。这是媒体和民意的一次胜利。时间指向最近几年，“高铁事故”、“药家鑫杀人案件”、“洛阳醉驾顶包”等事件，正是由于公众的关注度高而且热情持续不减，对相

* 黄钰钧，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公共关系 2011 级硕士研究生。

关部门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使得对应的机构从最初的遮遮掩掩到最后不得不正面回应，从而对事件的调查有着正面影响。民意正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并影响着执政者。

然而，在公共诉求取得胜利这个表象之下，有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民意是需要平衡的，公众的情绪容易被掌控。任何力量一旦被过度放大，都会模糊背后的真实。王石的“捐款门”就是最大的典型的例子。2008年，汶川地震震惊世界，社会各界都对灾区人民伸出了援手。王石也在地震当日做出了万科220万的决定。而此举被认为是“抠门”，引来网络上一片骂声。王石之后的辩护也变得越来越无力，万科的股价也随之受到影响。王石最后不得不向公众道歉，才让事情告一段落。

其实，在很多人看来，王石真的没有做错什么。如果说错的话，那就是他在公众情绪的高度敏感阶段做了这个决定。当时的感性已经占据了公众情感的主体，因而企业家们对于金钱的理性行为在公众眼中已经变得可恶甚至是可耻。

《乌合之众》中曾经说过：“有时，在某种狂暴的感情——譬如因为国家大事——的影响下，成千上万孤立的个人也会获得一个心理群体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偶

然事件就足以使他们闻风而动聚集在一起，从而立刻获得群体行为特有的属性。”王石的行为就是犯了众怒，然而，由于公众对于这一事件普遍的恶评和讨伐，掩盖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缺陷，将危机引向了一个相反的方向。这样的现象值得我们整体进行深思。

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心理群体是一个由异质成分组成的暂时现象，当足够数量的不同个体结合在一起时，就像是诸多有机质汇聚在一起形成的细胞一样，当这些类别成分完全不同的细胞组成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时候，这个新生命个体的表现与构成他的细胞组织完全不同。”处在群体中的个体与单个的个体存在着差异，造成这种差异化的原因，《乌合之众》中将之归结为三点：

首先，群体的普遍性格特征受无意识支配。“人们在智力上差异巨大，但却有着非常相似的本能和情感。”在无意识的深层结构中，都包含着时代相传的无数共同特征，它们影响着种族的禀性。在笔者看来，中国人的公众情绪中经常混杂着自卑与自大，这些都与国人所经历的事件有关，鸦片战争后近百年的屈辱和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导致了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发展不平衡，思想也在这飞速的发

展中变得迷惘……这些都对种族的禀性产生了影响。在捐款门事件中，还暴露出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愤怒。这些愤怒由“贫富悬殊”、“生存压力巨大”等社会问题而来，这些都是构成了公众的无意识结构的要素，最终在公众情绪膨胀的时候彻底喷发。

其次是传染，这对公众情绪的形成起着决定作用，同时还决定着它所接受的倾向。传染虽然是一种容易确定其是否存在的现象，却很难解释清楚。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感性、本能的情绪特别容易传染，理智、冷静的情绪在群体中丝毫不起作用。这种特点在互联网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来自网络的声音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情绪激进主义者，另一方则自然是冷静的理性主义者。情绪激进者的言论是最吸引眼球的，他们的声音最为响亮，声势最为浩大。理性的声音在这当中几乎没有任何位置。中立者最容易受到情绪的感染，进而情绪激进者的队伍也越发壮大。互联网是最“鼓励”那种情绪激进主义者的非黑即白的争吵，在激烈的争吵中，事实的真相便会被掩盖。例如2010年6月9日掀起的“反韩”热潮，正是公众情绪所演化成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通过网站论坛、邮件、博客

等媒介，在公众中不断地传染开去所导致的。这股反韩热潮是由于当时世博会的踩踏事件所导致的，但同时也是多年对于韩国不满情绪的一次集中爆发。但这种爱国旗帜下的热潮，对于社会进步而言所拥有的意义在哪里，理性主义者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第三个原因是暗示，这也是由上面的传染现象所造成的结果。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地震，引起的海啸带给了日本核泄漏危机。当时专家言明让民众不必恐慌核辐射，同时对核辐射进行了科普，说是碘盐可以防辐射。然而，日本的核泄漏危机经过网络被无限放大，引发了抢盐热潮。一时之间，各地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盐荒”。这次的“盐荒”事件表现出的骇人的传播力量，是群体接受暗示之后所创造的。任何群体都期待他人的注意，因此很容易受人暗示。只要群体中的一个人对真相进行了歪曲，传染性的暗示过程就开始了。“盐荒”事件便是这一理论的典型案例。在暗示和互相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个体编造的所谓“事实”——“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混为一谈”，立刻就被多数人接受。而这种忽视真相的非理性传播活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抢盐”事件一度引起了社会

的不安。

第四点是非强势个人很容易融入群体，在群体中个人的责任感会消失，并且会导致欲望的宣泄。这是笔者个人的意见。处在群体中时，个人会发泄出自己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个人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由于非强势个人在群体中力量过于渺小，他也不必承担责任，这样一来，个人只能在集体行动中才能找到意义。进而很多情况下，我们的勇气总是通过群体来表达。在群体中非强势个体摆脱了自己的思想，感觉到了群体强大的力量，人们平日遏制的欲望在群体中便可获得大量宣泄。这也是在大多数人看来，网络民意充满的不可理喻和杀气、网络的言论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是如此的幼稚和不堪一击。

这种公众情绪的高涨与泛滥，并非中国所独有，任何一个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国家都会面临这样的过程。随着中国不断地融入世界，经济实力稳步地提升，中国人对于身份越来越敏感，当然，这跟中国

近百年所经历的历史有关。对于民意的狂热现状，我们应该理性分析，既不应该悲观也不可过分地乐观。我们不能让这种模糊的情绪成为公众真正的信仰。如果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主宰了社会主流思潮，那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很多情况下，历史是惊人相似的。很多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从封闭、压抑到自由开放，在这个过程中，民意成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然而，由于勒庞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变革时期，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博弈，因此在《乌合之众》中过多地强调了公众的非理性因素。但就现在来看，群体的观点还是可以通过强势个体进行影响。受众不应该主动地被群体强势观点所同化，作为舆论的引导者和把关人，政府对于民意也不能一味地进行封堵。“群体无意识”的民意，不管在过去还是未来，都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要意义，不能被执政者所忽视。

（责任编辑：李沁笛）

那些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读《狂热分子》

李沁笛*

“当希望和梦想在街头汹涌澎湃的时候，胆怯的人最好门起门扉、关上窗户，蜷伏着以待怒潮过去。因为在希望（不管是多崇高和良善的希望）和它所带来的行动之间，往往存在着重大的不协调，一如在《启示录》里，传布末日四骑士（饥饿、战争、瘟疫、死亡）降临的，乃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

在读完霍弗的《狂热分子》一书后，我牢牢地记住了这段话，霍弗用深刻而清晰的笔调了描摹了一群狂热分子的形态，就像是以常春藤遮身的少女和头戴花冠的青年一样，希望与行动并不一致。

《狂热分子》的作者埃里克·霍弗是一个传奇的人，他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双双早亡，过了十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四十岁上终于有了一份正式职业：码头搬运工，也就是在旧金山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孕育出了这本书——一个码头工人，对于群众运动的思考。

霍弗自己的一生是与“畸零人”和“失意者”为伍的一生。那些弱者、穷人、被压迫者、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逃犯、不肖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谓之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革命家把他们作为群众基础、革命动力、炮灰和信众，霍弗把他们当做群众运动的行为者来剖析。

霍弗所定义的群众运动是广义的群众运动，其范围包括政治运动、革命运动、社会运动、宗教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等等。他说，群众运动的忠实信徒往往是一些失意者，因为“失意者之所以追随一个偶像，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把他们带到一片应许之地，不如说是因为偶像可以把他们带离他们不想要的自我”。霍弗的观点像是一把利刃，直接插入了失意者或者说群众运动发起者的灵魂深处，仅仅是为了“离开他们不想要的自我”而已，这种自我或者正义或者非正义，并不需要去鉴别，只需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便可以扯起一面正义的大旗去理直气壮地追求自我，这是狂热分子的实质。

“当我们个人的利益与前途

* 李沁笛，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看来不值得我们为之活下去时，我们就会迫切需要为别的事物而活。所有形式的献身、虔诚、效忠和自我抹杀，本质上都是对一种事物牢牢攀附——攀附着一件可以带给我们渺小人生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因此，任何对替代品的拥抱，都必然是激烈和极端的。我们对自己只能有有限度的信心，但我们对国家、宗教、种族或神圣事业的信仰，却必定是夸张和不妥协的”。按照霍弗所描述的，显然霍弗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青”，或者是站在一个我们所谓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阐述他的思想，他单纯地从群众运动主体的心理出发，最终展现出一种隐晦的真实。当一个人空虚无助甚至无力成就自我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心理的驱动下，盲目地投身与某种“神圣事业”，以此寄托自己的情感并且掩埋他的一切缺点与不负责任的态度。至于这种事业究竟是什么，投身于这种事业究竟为了什么，并不是他所关心的，这种事业可以是政治，可以是宗教，民族主义、共产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成为狂热分子的载体，因为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这么一个载体而已，这种载体的本质并不重要。

《狂热分子》成书于 1951 年，但是这本书就像一个精准的预言，

后来的无数事例告诉世人，狂热分子无处不在。无论是巴勒斯坦的人体炸弹，9·11 事件中的 19 个恐怖分子抑或 MSN 上的红心、生活中的愤青，还是 2012 年在中国爆发的打砸抢烧事件——《狂热分子》中描述的狂热者在当今无疑仍在以最快的速度被复制发行，并且正在像当年袁世凯发行的伪币一样成为历史的注脚。

群众都太空虚了，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

即使曾经令人热血沸腾的入党宣言，在今天也不过是一场因为学习工作需要而匆匆进行的过程而已。为某种事业而献身的口号，空洞地甚至不如一句直白的谎言，不会有人再信以为真。就像那场在中国发生的由于钓鱼岛争端而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运动一样，狂热分子最终挥着道义的屠刀，砍向了自己的同胞。这不折不扣是霍弗所描写的狂热分子，除了一个虚幻的精神载体，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赤裸裸地犯罪并且引以为傲，拒绝一切劝阻，不听任何谴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狂热分子无异于一群疯子。在这一点上，霍弗说得一针见血，他说“爱国主义是歹徒的最后归宿”。在中国爆发的这场运动中，那些打砸抢烧自己国人的人，他们

不是爱国群众，而是歹徒。他们是以“常青藤遮身的少女和带着花冠的青年”，披着美好的外衣来兜售罪恶。

而且这些狂热分子很难被改造，霍弗在书中说，“你无法用理性或道德上的理由去说服一个狂热者抛弃他的大业。他害怕妥协，因此你不可能让他相信他信奉的主义并不可靠。但他却不难突然从一件神圣伟业转投另一件神圣伟业的怀抱。他无法被说服，只能被煽动。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他所依附的大业的本质，而是他渴望有所依附的情感需要。”

从这一点来看，群众运动更像是一个骗局。一个由心怀不满的言辞人所煽动，许多狂热分子参与的阴谋，目的是为了解决言辞人的不满，而在其过程中这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形式则满足了狂热分子空洞的心理。所以，聪明的国家领导者，最该警惕的就是那些言辞人，那些不满的诗人、作家、历史学家、学者、哲学家之类的人物。“不管一个抨击当局的言辞人，多么相信自己是为被压迫者和受伤害者仗义执言的斗士，他的动机十之八九都是私人的和个人性的”——有着不被承认不受赏识的“隐痛”。

古今中外这种例子并不罕见，想象一下如果蔡元培当年批给了

青年毛泽东一个北大图书馆的正式编制职位，也许中国历史就要该写了；如果当年普鲁士政府授予了青年马克思一个政府职位，也许共产主义历史就要该写了。这种假设并不无聊，至少我们隐约可以看出为什么在现代中国会出现广招公务员的现象，为什么每一位领导者都要强调思想意识形态建设——言辞人即读书人，笼络住了读书人，没有言辞人的煽动，狂热分子的运动便会失去支柱，政权才更加稳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当然霍弗本身并没有完全否定群众运动，他说“说来不可谓不奇怪，狂热既是一种灵魂的疾病，却又是一种可以让社会和国家振衰起弊、死而复生的神奇工具。”

在书的最后一部分，“狂热是一种灵魂的疾病”中霍弗写道“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大不幸，大概就是因为群众运动（太平天国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衰落的太快或太早被捻熄。中国没有能够产生斯大林、甘地或凯末尔这样的人，让一个群众运动的一持续到改革生根的程度。”

可以看出霍弗并不完全了解中国，他不知道在 1951 年的时候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斯大林式的人物。也正是在这个人统治下的中国，群众的自我意识一度彻底被泯

灭，群众运动彻底变成了霍弗所描述的形态，成为了一种灵魂的疾病，狂热分子们炮制出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使中国的历史为之胆寒并且它的弊病一直蔓延到今天。

这种灵魂疾病表现在很多方面，譬如一句口号一个徽章就可以成为力量的来源，盲目的崇拜与追随让中国在极端的年代中出卖了未来，甚至在于今天，依旧要在真实与愿景中拉上一道帷幕。当看到电视节目里衣冠楚楚的记者们满大街地追问“你幸福吗”，狂热分

子是否会安静地思考这个问题，而清醒的人们是否会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只有在看新闻联播时，我们才是幸福的。

这些违背常识的行为和思维正是灵魂的疾病，而这些似乎又是我们的生活之中所常见的。要想根除这种灵魂的疾病靠打针吃药是不行的，制度和文化的改变才对医好群体的疾病有所贡献。在这个狂热而信仰缺失的年代里，灵魂的疾病，还需要灵魂来拯救。

（责任编辑：李沁笛）



专题报道

白俄罗斯驻沪总领馆赠书仪式暨白俄罗斯诗人 诞辰纪念晚会在我院举行



白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馆赠书仪式暨白俄罗斯伟大诗人杨卡·库巴拉和雅库帕·科拉斯诞辰 130 周年纪念晚会于 2012 年 12 月 14 日在我院白俄罗斯研究中心举行。副校长范军会见了前来参加活动的白俄罗斯驻沪总领事弗·列·沃罗别伊和夫人及其他白方客人。

在赠书仪式致辞中，范军副校长强调了人文交流与合作对于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互信、夯实社会基础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表示，由于有密切和务实的合作，美丽的白俄罗斯对于华东师大的师生来说并不遥远。他感谢白俄罗斯驻沪总领馆和总领事本人对我校白俄罗斯研究中心工作的支持和帮助。在热烈的掌声中，范军副校长接过沃罗别伊总领事递交的赠书目录，与总领事一起打开赠书上的红色缎带，并代表学校向白俄罗斯驻沪总领馆回赠了《耕织图》。

在随后举行的白俄罗斯伟大诗人杨卡·库巴拉和雅库帕·科拉斯诞辰 130 周年纪念晚会上，我校白俄罗斯留学生用中俄两种语言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创作、意义和影响，朗诵了诗人的作品。我院师生代表参加了活动并与白俄罗斯客人和留学生进行了互动交流。（摘自国关院网站）

“周边合作与中国成长”学术论坛在沪举行



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周边问题的研究，2012年12月20日，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光明日报社在上海共同举行了第一届周边合作与发展论坛。

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周边合作与中国成长。来自北京、上海及海外相关机构的一流专家学者参加论坛并做主题演讲。论坛围绕以下四个论题展开：“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合作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新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成长”，“中国成长与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周边治理：中国模式及历史经验”。

周边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我校党委书记童世骏教授及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李春林在论坛上致辞，周边中心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教授，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周弘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邢广程研究员，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黄靖教授，周边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任晓教授，我校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先后作了精彩的主题演讲。演讲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对当前现实问题的缜密思考；既有操作性的真知灼见，又有从历史的经验教训出发的深刻剖析。精彩生动的演讲引起与会者的共鸣，同时也激起了论坛参与者热烈的讨论，大家围绕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国边疆治理、中国海疆问题、北极航道等问题与演讲者进行了热烈的互动。

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是根据教育部2011计划精神，由华东师范大学牵头，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共同创建的创新型研究机构，于2012年9月20日在北京举行揭牌仪式，并于当日举行了第一次工作会议。

2012年12月19日下午，中心第二次工作会议在我校中北校区逸夫楼国际交流中心举行。我校副校长朱自强，校长助理、许红珍，社科处处长顾红亮，周边中心主任、我院院长冯绍雷，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北京大学社科部副部长萧群，复旦大学文科处处长杨志刚，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沈丁立等出席了会议。

朱自强指出，建设周边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就是要打破旧有的研究体制束缚，真正搭建一个学术合作的创新型平台，推动人文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协同各方将会精诚合作，努力尝试，深入探索新型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模式。

周边中心的宗旨是以“国家急需、世界一流”为总要求；以我国周边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安全战略问题为研究重点；以实现和谐、平等、文明、繁荣的环陆海周边环境为努力方向；以周边研究的新知识体系构建和学科建设为基础；以机制体制改革为建设重点；以提升周边研究的创新能力为突破口；以海内外知名高校、智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协同创新为工作模式；围绕着国家和社会的重大而紧迫的需求，提供高效的资政服务，构建新型的高水准学术共同体和高端智库。

（摘自国关院网站）

（责任编辑：曾乔圆、杨晓娜）



简讯

1. 2012 年 11 月 29 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郭岱君教授访问我院，并做了题为《重看抗战：蒋介石日记揭密》的主题演讲，演讲由冯绍雷院长主持。郭教授围绕抗战时期的“蒋介石日记”所提供的材料和信息重新解读了抗战的爆发和蒋介石的战略部署，并且将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的心态变化进行了详细分析。郭岱君教授通过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与会师生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抗战的视角。
2.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友好合作二十年”摄影展开幕式在我校召开，我校副校长范军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萨伊达卡摩勒·阿戈扎姆赫德耶夫为开幕式致辞和剪彩。我院书记贝文力老师担任开幕式主持。
3. 2012 年 12 月 3 日，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校副校长安德烈·雅科夫列夫访问俄罗斯研究中心，并为我院师生作了题“‘New Deal’ in state-business relations in Russia: reasons and barriers for implementation”的专题演讲。演讲主要围绕俄罗斯国内国家与商业的关系，以精英为主要研究视角，通过详细数据和对比法展示了俄罗斯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对国内商业环境的影响及引发的不同结果，并且深入分析其成因和未来发展演变的可能性。演讲由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成主持，俄罗斯研究中心青年研究人员，《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和部分研究生参加了会见。
4. 2012 年 12 月 11 日，俄罗斯著名宇航员、政治家、学者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巴图林访问俄罗斯研究中心。我院书记贝文力老师向巴图林先生介绍了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以及上海的有关情况，巴图林先生就中心学者感兴趣的关于俄罗斯的一些问题与大家做了交流。
5. 2012 年 12 月 15 日，乌兹别克斯坦著名学者、政治家、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人权中心主任萨伊托夫教授应邀访问俄中心。萨伊托夫教授就乌中两国之间的法治建设、司法制度比较等问题与我院学者进行了探讨。
6. 2013 年 1 月 4 日，由《闻道》编辑部主办的“基辛格《论中国》主题研讨沙龙”在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 A413 举行。本次沙龙的发起者邱立波副教授主持了沙龙，沙龙特别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专门研究基辛格思想的周一骏博士作评论嘉宾，我院封帅博士也应邀参与了讨论。我院硕士研究生陈安龙、吴途勇、姜边、尹亮、王亦冰、蔡一麟、郭旺、李后立、杨晓娜、陈邹斌、吴翔、高艳芳、郑志光、黄仲恺、李娟等同学提交了主题报告，或参与沙龙讨论。

7. 2013 年 1 月 9 日，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行政管理研究院陈志昊博士访问俄中心。我院书记、俄中心副主任贝文力老师会见了陈志昊博士。陈博士向俄中心领导介绍了俄罗斯联邦总统直属国民经济与行政管理研究院的科研状况及学术特点。此外，陈博士受俄方院领导的委托向俄中心表达了加强双方机构合作的意愿，并就俄方即将开设的针对俄罗斯各级官员的中国国情和中俄关系课程项目提出具体合作建议。
8. 2013 年 3 月 19 日，中国前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等多国大使姚培生先生到访我院并做了精彩报告。姚大使结合自身多年的外交实践经历，就中俄关系、中亚及阿富汗形势、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等问题发表看法。本次研讨会由我院党总支书记贝文力老师主持，我院院长、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冯绍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沈志华教授，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刘军、王海燕、郑润宇等老师以及部分研究生参会。

（责任编辑：曾乔圆、翁伏虎）



院外播报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表国情咨文

2012年12月12日，即“俄罗斯联邦宪法日”当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议会发表了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Посланиепрезидентафедеральномуособраниюна 2013 год）。这是普京今年5月再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后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同时也是他作为总统的第九次国情咨文报告。12日中午12点整，来自俄罗斯议会、政党、政府、地区和社会各界代表1000人齐聚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听取总统普京对俄联邦会议做的报告。在近90分钟的演讲中，普京把重点放在了俄罗斯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以及未来如何发展等问题的阐述上。普京认为，21世纪的前12年俄罗斯经历了恢复和重振国家实力的重要阶段，而当今的任务则是把俄罗斯打造成富有和令人满意的国家。

（译自《俄罗斯报》）

俄罗斯举行“第17届俄罗斯高校国际关系教学方法”会议

2013年2月20日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МГИМО）举行“第17届俄罗斯高校国际关系教学方法”会议，会议就现代教育的发展趋势、利用国际上通行的教育规划、以及开展国际化教育展开讨论。会上教学协会会长、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多尔古诺夫做了题为《建设国际高水平大学：俄罗斯高等教育新的发展趋势》的报告，指出了当代国际关系学发展面临的迫切问题。此次会议的举行对推动俄罗斯国家关系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译自《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网站》）

“东亚区域合作——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

2012年11月29日—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主办的“东亚区域合作——机遇与挑战”学术研讨会在山东财经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召开。来自商务部国际司、发改委宏观院、商务部研究院亚洲与非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等30余位学者和官员参会。会议围绕东亚区域合作领域的最新动态与关注热点，充分结合经济合作的理论分析，对东亚区域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的路径选择进行了充分讨论，对协调好各类机制的艰巨性进行了充分估计。在国际金融危与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与会者对东亚区域

合作继续深化的前景仍保持乐观。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网站)

“中国与 G20：中国对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学术研讨会

“中国与 G20：中国对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于 2012 年 12 月 3 日—4 日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举行。来自中国、德国、韩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学术机构的多位学者参与了本次研讨会，探讨在各方努力解决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并重塑全球经济的情况下，G20 在全球经济新秩序发展中起到的作用。系列研讨会采用跨学科和跨国方法研究全球经济治理。本次研讨会着重讨论在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于 G20 的贡献和作用，并检验中国在全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在 G20 内的作用。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与中国崛起、全球权力转移和区域合作日益密切同时出现的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中国与全球和区域合作伙伴的双边关系，中国在多边机制中的参与，中国在 G20 各议题上的不同立场以及 G20 扩充议题等具体问题。

(摘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网站)

“联盟理论与中国联盟战略”学术研讨会

2012 年 12 月 8 日“联盟理论与中国联盟战略”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来自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等单位的 8 位学者做了会议主题发言，来自全国多所高校的近百名师生参加了会议研讨。会议从联盟理论、联盟战略、中国联盟战略的论证和反思等多个角度对联盟问题和中国外交战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摘自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网站)

第四届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

第四届俄罗斯东欧中亚与世界高层论坛（2012）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在北京召开，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举办，来自北京、上海、黑龙江、辽宁、吉林、四川、陕西等全国各地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学术机构、高等院校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我院院长冯绍雷做了题为“俄罗斯国内新一轮政治经济竞争中的问题与走势”的讲演。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 2012 年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形势作了报告，进行了深度分析。会议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摘自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网)

“2015 年后的国际发展合作：欧洲与新兴经济体的视角” 研讨会

2013 年 1 月 12 日至 13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发展研究所联合举办“2015 年后的国际发展合作：欧洲与新兴经济体的视角”国际研讨会。联合国副秘书长吴红波莅临会议，并作主旨发言。会上，来自中国、德国、南非、印度、墨西哥、巴西以及联合国的学者专家围绕 2015 年后国际发展合作的目标设定、新兴经济体承担的责任与发挥的作用、千年发展目标框架下的南南合作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摘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和新兴国家的影响”研讨会

2013 年 1 月 21 日至 22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德国艾伯特基金会上海办公室联合举办“欧债危机：对全球经济和新兴国家的影响”国际研讨会。中国外交部欧洲司副司长胡兆明莅临会议，并作主旨发言。会上，来自中国、德国、西班牙、印度、韩国以及欧盟机构的学者专家围绕欧债危机现状、未来走势、应对策略以及对全球经济影响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摘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新发展与中英合作”学术讨论会

2013 年 1 月 24 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全球经济治理架构新发展与中英合作”学术讨论会。来自英国外交部、英国财政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专家与国研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张海冰、所长助理叶玉、金融贸易室主任查晓刚等就全球经济治理架构的新发展、中英关系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摘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责任编辑：曾乔圆、翁伏虎）